

【中国思想史】

唐代长安与西方宗教文化交流的研究

王维坤

(西北大学 文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在7世纪初期至8世纪中叶的唐代,首都长安不仅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也是中外人员进行友好往来、商品贸易以及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所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唐长安城遗址中出土了一些有关宗教文化交流的文物,这为我们研究唐代长安与西方的宗教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许多极为宝贵的资料。这些文物的出土,一方面证实了文献的记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使一些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关键词:唐代;长安;东罗马;波斯

中图分类号:B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2)04-0025-06

7世纪初期至8世纪中叶的唐代,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而且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时期,同时也是商业和交通业空前发展的历史时期。伴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四通八达交通网络的初步形成,接踵而来的是在全国相继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商业大都市,其中有长安、洛阳、扬州、益州、荆州、汴州等都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首都长安当时不仅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成为中外人员进行友好往来、商业贸易以及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所在。随着唐代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和繁荣,唐代长安与西方的外交往来和商业贸易日益密切,尤其是唐代长安与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众所周知,唐代长安城是在隋代大兴城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只是新增建了大明宫,其他设施则沿袭未改。全城呈东西向的“横长型”,城内主要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所组成。宫城位于全城的北部中央,是皇帝听政和居住的地方。皇城位于宫城之南,是中央官衙府寺的所在地。外郭城分布在宫城与皇城的东南部和西南部,是居民区和商业区。外郭城的東西長 9 721 米,南北寬 8 651.7 米,周長為

36.7 公里,面積為 83 平方公里[1](P573~574)。像這樣規模宏大、擁有百萬人口的長安城,不僅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就在世界上也是當時最大的城市之一。居民區的里坊排列是以皇城之南朱雀大街為中軸線,將全城分為東、西兩大部分,並形成了東、西完全對稱的格局。東側南北向 5 行縱坊,東西向 13 排橫坊,共計 54 坊和 1 市;西側同樣是南北向 5 行縱坊,東西向 13 排橫坊,共計 54 坊和 1 市。這樣一來,全城形成棋盤式格局,有南北大街 11 條,東西大街 14 條,合計 108 坊。高宗龍朔以後為 110 坊,玄宗開元以後減到 109 坊[2](P63)。另外,隋文帝在開皇二年(582 年)建造隋大興城時,就在皇城的左前方和右前方分別設置了兩個市場。東邊為“都會市”,西邊為“利人市”,各占兩坊之地。到了唐代,僅將“都會市”改為“東市”,將“利人市”改為“西市”,而其位置和規模未做任何移動。在市內建有很多邸店,供客商居住和存放貨物。陳列貨物和出售貨物的地方稱之為“肆”。為了方便起見,唐代的作坊和肆往往連在一起,既是生產場所又是銷售店鋪。同類商品的生產和銷售集中在一個區域里,稱作“行”。據《唐兩京城坊考》記載:“街市(即東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3](P124)正因為

收稿日期:2001-07-25

作者簡介:王維坤(1952-),男,陝西渭南人,西北大學文博學院教授,日本同志社大學文學部客座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博士,主要從事隋唐考古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比較研究。

东市商贾云集,肆行林立,所以在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4](P210)。由此可以不难看出,当时的东市是空前繁荣的。值得指出的是,西市是中亚、波斯、大食等西方商人和少数民族聚居贸易之地,其繁荣程度也远在东市之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居住在长安西市的商胡们,在唐代7~8世纪的中外文化和宗教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为不断发展和繁荣唐代社会的商品经济,促进和加深各国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大团结,的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向达先生曾经指出:“唐代与西域交往甚繁,文物方面受影响亦所在可见。”[5](P1)本文作者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出土的新资料,从宗教文化入手,对唐代长安与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这一研究课题再做进一步探讨。

唐代初期,随着大批西方商人进驻唐代首都长安城,西方的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五大宗教也自然而然地在长安城安家落户了。随之而来的是,先后又在城内相继建造了为数不少的各类寺院和祆教袄祠等建筑,成为宗教信奉者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在首都唐代长安设立各类寺院和祆教袄祠,这本身就是对其信奉者最大的支持与安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唐代对于外来宗教所持大度包容的态度。与此同时,这也无形中加深了唐代宗教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接触与融合。发现的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唐代社会的确是一个空前开放和繁荣的社会,又是一个善于吸收和包容外来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社会。当然,唐代吸收外来文化并不是盲目地、无条件地全盘接受与吸收,更不会全面地排斥与否定。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如同日本在奈良时代(710~794年)学习、模仿和吸收唐代文化一样,总是在不断吸收那些符合本国国情的外来文化。所以说,五彩缤纷的大唐文化,实际上也是在广泛包容与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佛教、寺院与佛塔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相传在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中,佛教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答摩(Siddhartha Gautama,即释迦牟尼)所创立。佛教是当时反婆罗门的思潮之一,以无常和缘思想反对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以众生平等思想反对婆罗门的

种姓制度,因此得到很快流行。其基本教理有“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成佛为最终目的。佛教这些教义由于为我国统治者所信奉,所以便在东汉明帝永平六年(67年)(在佛教学术界,主要有“汉明求法说”和“汉明之前传入说”两说,本文作者采用“汉明求法说”)开始传入我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四五百年间,佛教的翻译与研究日渐发达,到了隋唐时代,遂产生了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许多宗教教派。同时,佛教的思想和文化也对我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都给予了巨大的影响。

毋庸讳言,唐代佛教是在隋代佛教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公元581年,隋文帝建立隋朝之后,一改北周武帝毁灭佛法的政策,而把信奉佛教作为维持巩固自己统治权力的基本方针之一。现在看来,这与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抚养和即位时县延力请兴复佛教是不无关系的。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开皇元年(581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长安)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儒家)六经数十百倍。”[6](P1 099)由此可见,早在隋代初年,佛教就出现了同儒教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儒教影响的势头。另外,开皇十年(590年)的僧尼人数不仅多达50余万[7](《续高僧传·靖嵩传》卷10、《续高僧传·昙迁传》卷18),而且隋文帝还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为大兴善寺,并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还在他所经历的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同时还建有延兴、光明、净影、胜光及禅定等寺。相传隋文帝所建立的寺院共有3792所。不仅如此,隋文帝还先得天竺沙门给他的佛舍利一包,令全国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前后建造了110座佛塔,并建造金、铜、檀香、夹纻、牙、石等像大小16580躯,修缮故像1508940余躯[7](《辨正论》卷3)。并且在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二月下诏:“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示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6](P45~46)此外,还缮写新经132086卷。修故经3853部

[7](《辨正论》卷3)。值得一提的是,隋文帝还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佛教义学的传教系统,选聘当时各学派著名的学者,集中在都邑地区进行传教。在长安曾建立了25众[7](《续高僧传·义解篇后论》),大兴善寺沙门僧璨即曾为25部第一摩诃衍匠,大兴善寺沙门僧琨也做过25众教读经法主[7](《历代三宝记》卷12,《续高僧传》卷7、卷8),从事学众的教导,这无疑极大地推动了隋代佛教的传播。

其实,隋炀帝(605~616年)也笃学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颢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颢为智者。即位后,也同文帝一样,在长安各地大造佛寺。初步统计在隋唐长安城内共建有200余座佛寺[2](P359~382)。不过,寺院在各坊的分布情况也大不相同。一坊之内多则建造6座左右,少则1座,还有许多里坊连一座寺院也没有建造。宿白先生以前曾经描绘了1张隋大兴、唐长安城布局的复原图。其中,标明了隋佛寺、唐佛寺、唐胡寺、道观以及官衙王府等建筑的分布情况和所在位置,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隋唐长安城佛寺分布的重要图像资料[8]。隋代的寺院建筑,主要是以文帝所造的大兴善寺、大庄严寺(即禅定寺)和炀帝所造的大禅定寺为最宏伟。例如,大兴善寺中的“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号曰大兴佛殿”[9](P349)。东禅定寺的规模为“驾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耸,房宇重深,周间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7](《续高僧传·昙迁传》卷18)。大禅定寺内“亦有木浮图,高下与西(此处‘西’似应作‘东’)浮图不异”[9](P38)。大禅定寺的规模由此也可见一斑。

进入唐代以后,统治阶级也非常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在京师(长安)聚集高僧,立十大德以统摄僧尼。武德九年(626年)五月,由于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高祖终于下令沙汰佛道二教,只允许京城留寺3所,观2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寺观1所,余悉罢之。后因皇太子争位的变故而未能实施,变成一纸空文。太宗即位以后,又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3000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一共7所,这无疑促进当时佛教的开展。尤其是贞观十九年(645年)著名僧人玄奘从印度求法归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他以深厚的学养,精确无误的译传,给予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继天台、三论两宗之后,这时又出现了慈恩、律宗等宗派。此后,武后在载初元年(690年),“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

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袿娑、银龟袋。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10](P4742)。武则天利用怀义与法明等人所造《大云经》来蛊惑人心,我认为如同武则天造字的目的一样,完全是为了“粉饰和标榜武周”[11](P374)的一统天下。其目的不仅为了给武周政权披上一个合法的外衣,也使她自己能够堂而皇之地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从这一点上来说,佛教被武则天充分地加以利用,成为她改朝换代的舆论工具。

唐代长安的寺院相当多,最为著名的就是大慈恩寺和大荐福寺。此外,不仅有实际寺等寺院,还有迄今为至保存完好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大慈恩寺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东部,原为隋无漏寺之地,唐武德初年废。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太子李治为追念亡母文德皇后,选此林泉形胜之所,立为大慈恩寺。后来,自宏福寺迎请从印度取经回国的玄奘法师为寺上座,移住本寺东院翻译佛经,同时协助他译经的还有国内著名学者和名僧数百人,成为长安佛经三大译场之一,尤其是玄奘还在此寺创立了佛教的一大宗派慈恩宗。在寺西院建有佛塔,这就是驰名中外的大雁塔。大荐福寺位于唐长安城开化坊南半部。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高宗死后百余日,为给高宗献福而立为大献福寺,度僧二百人以实之。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改名。中宗即位以后,于景龙年间(707~710年),在南对面安仁坊本寺浮图院中,修建了十五级佛塔。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小雁塔。大荐福寺也是长安佛经的主要译场之一。唐代著名高僧义净赴印度取经回国后,于中宗神龙二年(706年)入居此寺主持译经,所以说,荐福寺大荐福寺也是长安佛经的主要译场之一,实际寺位于唐长安城太平坊西南隅,也就是今天西北大学的所在地,本名实际寺。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之妻郑氏舍在宅而立。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殇帝为温王,改为温国寺。宣宗大中六年(852年),改为崇圣寺。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寺内净土院,为京城之最妙院。”[9](P10~11)在该坊的西门之北,还建有定水寺。这是隋开皇十年(590年),荆州总管上明公杨纪为慧能禅师以宅立寺。另外,王铁宅有一座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初之,凜若高秋。又有宝钿井阑,不知其价。值得指出的是,1953年在西北大学修东操场时,发现了一大钱窖,出土“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铜钱4245公斤。1980~1982年,在修建西北大学宾馆和宾馆餐厅时,还在此处发现了莲花纹

瓦当、石经幢残片、善业泥、须弥座残片以及贴金菩萨像残块等,这应是唐实际寺的遗存[3](P168~169)。1992~1993年,戴彤心先生还对图书馆前、图书馆东侧以及教学七楼工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太平坊西坊墙、唐清明渠遗址、墓葬以及大量有关实际寺的遗迹与遗物[12](P20~30)。不仅如此,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工作队还对西明寺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100多件鎏金铜像及其有关佛教遗物,并发现了殿堂、回廊、庭院、窖、水井以及1件刻有“西明寺石茶碾”六字的石茶碾[13]。当然,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考古发现,就是在扶风发掘的法门寺地宫[2](P404~444)和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14]。1995年5月,还在西安市三桥镇出土了唐雕印梵文经咒,这是1件十分珍贵的唐代雕版印刷品[15](P130)。此外,还有一些考古发现。由于受本文篇幅的限制,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二、祆教与祆祠

祆教,在中国史书中称之“火祆教”、“火教”或“拜火教”,而将其寺院称之“祆祠”、“波斯胡寺”或“胡寺”。祆教大约是在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518~519年)从西方传入到中国的一大宗教。该教是流行于古代波斯、中亚等地的宗教。公元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在波斯东部大夏(今阿富汗的巴尔赫)创建,故有“琐罗亚斯德教”之称谓。此后,该教逐渐发展到波斯各地。祆教将《波斯古经》奉为经典。该教主张善、恶二元论,认为火、光明、清静、创造、生是善端;黑暗、恶浊、不净、破坏、死是恶端。善端的最高神是阿胡拉·玛兹达,即智慧或主宰之神;恶端的最高神是安格拉·曼纽,即凶神。认为在善恶两端之争中,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也有决定自己命运之权。人死后阿胡拉·玛兹达将根据生前之言行,进行末日判决,要求人们从善避恶,弃暗投明。据张永禄先生考证:“该教在南北朝时传入中国,首先在西域流行,后来北魏、北齐、北周的皇帝也都带头奉祀。隋唐时期并在东西两京都建立了祆祠,并设立了萨宝府和祀官,可见当时还十分流行。”[2](P388)所以我们说,祆教之所以能够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在长安城内安家落户,这与以皇帝为首的信奉者推崇和重视祆教是分不开的。也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在长安城内先后建造了五所祆祠(个别亦称“波斯胡寺”)。第一所祆祠位于布政坊的西南隅,称之“胡祆祠”,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立。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祆神,亦以

胡祝充其职;第二所祆祠位于醴泉坊十字街之东,称之“旧波斯胡寺”。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波斯王毕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年),幸臣宗楚客筑此寺地入其宅,遂移寺于布政坊之西南隅胡祆祠之西;第三所、第四所、第五所祆祠分别位于普宁坊西北隅、靖恭坊十字街南之西、醴泉坊西门之南,这些寺院的名称和位置在《长安志》中虽有记载,但所立具体年代不详。解放以后,考古工作者曾在唐普宁坊西北隅(该坊址在今西安城西任家口村与大土门之间)一带,发现了波斯银币、罗马金币、阿拉伯银币,同时还出土有用中文和巴利维文合刻的唐波斯人《苏谅妻马氏墓志》等重要文物。这些考古发现,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文献的记载是值得可信的。特别是1999年7月在山西太原发掘的隋代虞弘墓[16]和2000年5月在西安发掘的北周安伽墓[17],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有关中亚人或粟特人的最重要的墓葬,同时又是研究祆教在我国流行情况的最珍贵的考古资料。

三、景教与大秦寺

景教,亦称“基督教”。这是唐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另一大宗教,属于聂斯脱利派。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该教传教士大秦国(罗马)阿罗本由波斯来到中国,开始在长安传教立寺。到了唐高宗时,并不断向其他各地发展,以至“法统十道”、“寺满百城”。所建寺院,分别称之“波斯胡寺”、“景教寺”和“大秦寺”。在长安城内,先后建造有两所大秦寺。其一,是位于崇化坊的大秦寺。据宋人姚宽《西溪丛语》记载:“(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唐玄宗)天宝四载(745年)七月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在中国。爰初建寺,因此为名,将以示人,必循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并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县有者准此。”[9](P258)其二,就是位于义宁坊十字街东之北的波斯胡寺。这所寺院是唐太宗在贞观十二年(638年),专门为从波斯来的大秦国传教士阿罗本而立的大秦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大秦国传教士景净还立了一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螭首,莲座,高2.79米,宽0.99米,厚0.25米,碑额及莲座上都刻有十字架,题为《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碑文为景教传教士景净撰,朝议郎吕秀岩书,碑文楷书,32行,每行62字左右,计

1780字,详细记载了唐太宗贞观时期大秦国传教士阿罗本(Olopen)从波斯来到长安以后,受唐太宗优遇,在首都长安立寺布教,高宗以后又在各州遍置景教寺的情况,是研究基督教在中国流传的宝贵资料。碑底和两侧有古叙利亚文教士题名。此碑原立于长安城义宁坊的大秦寺,后因唐武宗会昌时该寺的毁废,此碑亦埋没于地,相传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出土问世。关于该碑的出土地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仍存有三种说法。一说认为原刊立在长安城崇德坊西南隅的崇圣寺附近;二说则认为在长安城西南的周至县境内;三说认为应在长安与周至之间。清光绪时期,丹麦人阿尔谟(Armo)以三千两白银收购此碑,欲盗出国外运往伦敦,引起朝廷和陕西巡抚高度重视,将其拦截,此碑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之内[2](P389)。一言以蔽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科学价值,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与叙利亚、希腊、波斯等国的宗教史、交通史以及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

四、摩尼教与大云光明寺

摩尼教,旧译“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牟尼教”。摩尼教属于古代伊朗宗教之一。三世纪由摩尼创立,故名。这是隋唐时代从西方传入我国的又一大宗教。该教信奉以《彻尽万法根源智经》、《净命宝藏经》、《赞愿经》、《婆布罗乾》为主的经典,以“二宗三际论”为根本教义。所谓“二宗”,就是指光明与黑暗;所谓“三际论”,就是指“初际”、“中际”、“后际”而言。也就是说,“初际”是指光明与黑暗各自的王国;“中际”是指黑暗侵入光明王国;“后际”是指光明战胜黑暗,明暗各自复位。摩尼教约于公元6~7世纪首先传入我国的新疆地区,然后在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波斯摩尼教高僧拂多诞来到长安之后,就开始广泛播教了。其实,早在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支汗那王帝矰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并请置法堂。开元二十年(732年),唐只准回鹘人信奉,禁止汉人人教。后来,随着回鹘人在长安的人数增多,建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唐代宗于大历三年(768年)终于应回鹘之请,下令首先在长安建摩尼教大云光明寺,大历十二年(777年)又在长江流域的荆、洪、扬、越各州及河南府、太原府等地各建一所寺院。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毁佛时,摩尼教的命运同祆教、景教一样,也遭受了空前的破坏与沉重的打击。不过,摩尼教在会昌之后,转而成为秘密宗教,并成为农民起义组织的工

具。

五、伊斯兰教与清真寺

伊斯兰是阿拉伯语 Islām 的意译,意为“顺从”。这是唐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另一大宗教。在中国旧称“回教”、“回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是7世纪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一大神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的产生,是当时阿拉伯半岛各部落要求改变由于东西商路改道而加剧的社会经济衰落状况和实现政治统一的愿望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穆罕默德以伊斯兰教为号召,在麦地那建立了主要代表贵族商人利益的政权,奥斯曼帝国等政教合一的封建国家统治的精神支柱。其教义主要有:信仰安拉是惟一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信天使,信《古兰经》是安拉“启示”的经典,信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安拉的“前定”,并信仰“死后复活”、“末日审判”等。该教规定念清真言、礼拜、斋戒、纳天课、朝觐等为教徒必须遵守的“功课”,并针对当时阿拉伯社会情况规定了若干制度和道德规范。伊斯兰教7世纪中叶开始传入我国,曾先后在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柯尔克孜、撒拉、东乡、保安等少数民族中传布,后来也在长安城内安家立户了。

清真寺,为伊斯兰教的寺院,位于今天西安城内鼓楼西北隅的化觉巷,原名“清修寺”,又称“东大寺”,通称“清真大寺”。寺内现存有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御史王拱撰写的《创建清真寺碑记》一通。根据碑文记载可知,该寺是唐玄宗敕令工部督工官罗天爵于天宝元年三月至八月所建。当时寺内主其教者为摆都而的,“的等恐其世远遗忘无所考证,遂立碑为记,以载其事焉。时天宝元年岁次壬午仲秋吉日立”[18](P199)。如果石碑的年代真正可靠的话,那么清真寺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1200多年前。不过,在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著、杨镰译的《长安事迹考》中,桑原隲藏博士就明确指出:“此碑确系明代伪作,不信为唐物。”[18](P199)20世纪90年代,都城研究学者张永禄先生也认为:“此寺现在的位置,系昔日唐长安皇城内尚书省处,亦非当时建立清真寺之所在。”[2](P390)现在看来,上述两位学者的考证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除此之外,我认为从清真寺的整体布局、楼台亭殿的建筑风格以及大殿的鸱吻、斗拱、彩绘等方面来观察,此寺的建造年代亦不可能早到唐代,而应该是一座具有中国明代典型建筑风格特点的寺院,同时又是一座明显带有伊斯兰教寺院

建筑风格特点的寺院。关于清真寺的历史,迄今为止我们虽然还没有找到年代更早的实物证据,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伊斯兰教和清真寺的继续研究。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大力展开和研究工作的步步深入,解决这一问题只是时间问题了。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任何一种外来的宗教,它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宗教的土壤中,栽培、移植、生长、开花乃至结果,这说明中国这里的宗教土壤完全适合外来宗教生存的条件。否则的话,它也会变黄和枯死的。毋庸讳言,植物的生长是离不开阳光和雨露,外来宗教佛教、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同样也是离不开统治者的信奉和推崇。唐代初年,由于这些外来宗教在中国受到极大的重视,所以很快就与中国的宗教进行了融合,发展演变成为一种“中国化”的外来宗教文化,遂产生了隋唐时期的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许多宗教教派。但是,佛教从敬宗、文宗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随着武宗会昌二年至五年(842~845年)“毁佛事件”的发生,兴盛一时的佛教终于被滑到了历史的最低谷。这样一来,以佛教为首的这些外来宗教最后都遭受了灭顶之灾,也都没有逃脱几乎被彻底毁灭的厄运。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2] 西安市地方志馆. 唐代长安词典[Z]. 西安:陕西人民出

版社,1990.

- [3] 徐松撰,李健超增订.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4] [日]圆仁撰,足立喜六译注,盐入良道补注.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 东京:平凡社,1987.
[5]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6] 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7] [日]高楠顺次郎·大正藏[M]. 东京:一切经刊行会排印,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三年(1924~1928年).
[8] 宿白.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J]. 考古,1978,(6).
[9] 杨鸿年. 隋唐两京坊里谱[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0] 刘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 王维坤. 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12] 柏明. 唐长安太平坊与实际寺[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13] 马得志. 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J]. 考古,1987,(4).
[14] 临潼县博物馆. 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J]. 文博,1985,(5).
[15]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寻觅散落的瑰宝[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
[1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J]. 文物,2001,(1).
[1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J]. 文物,2001,(1).
[18] [日]足立喜六. 长安事迹考[M]. 杨铨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责任编辑 徐怀东]

Study on the Communication in the Sphere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between Tang Dynasty's Changan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WANG Wei-kun

(College of Historical Relics and Museolog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It is well-known that Changan, the capital of Tang Dynasty from the early 7th to the middle of 8th century, was not only the core of national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but the center of friendly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xchange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Since 1950s, some relics about the communication in the sphere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have been unearthed, which provide us with precious materials on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phere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Western countries, confirm the correctness of records of som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solve doubtful problems in history.

Key words: Tang Dynasty; Changan; Eastern Rome; Persia